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

My Views on Economy,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宋养琰/著

【中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我的经济观·改革观·发展观

My Views on Economy, Re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卷)

宋养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自序

人的一生有许多“赶不上”：我想当个诗人，未赶上唐诗时代；我想当个词人，未赶上宋词时代。改革开放时代我算是赶上了，因而，我只好当好一名改革开放的战士。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个年头，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年代，作为一个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全过程并始终站在其前沿阵地的理论工作者，即战士，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发表的言论、观点和所作所为做一认真的和必要的梳理，并摘其要者，编辑成书，公诸社会，并以此为序。

我自信地认为，这本书不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而是密切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国内外实际，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应当说，我说的都是真话，“话语权”的“专利”无可非议的属于自己，也会一生坚持这些观点。

书中的诸多观点，究竟有哪些可取之处？虽然不能说我所论述的观点全是真理，句句有用，更不敢奢望每个读者都同意我的观点。但事实证明，其中不少观点和论述对改革开放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已为社会广泛所认可和接受，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改革开放实践中。

这里，谨将书中的重要观点择其要者，呈述如下。

——**观念更新：改革的先行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遇到重重阻力，进展缓慢，当时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观念更新：改革的先行官》，有针对性地指出：当今时代，对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讲，想要赶上先进国家，即便把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科技都移植过来，如果人的素质不从根本上提高，使之成为现代人，照样改变不了落后状态。因为

再完美的科技和工艺，再先进的管理方法，也会在一代传统人的手里变成一堆废品。传统人的主要特征是：迷恋过去，盲目服从和信赖往日的权威；害怕和恐惧革新和变革；不信任甚至敌视新思想、新观念、新潮流；安于现状，缺乏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凡事总以古人、圣人、伟人或本本是从，否则，就横加指责、漫骂和诋毁；妄自尊大，闭目塞听，等等。传统人从根本上说，不思进取，不求进步，是时代的落伍者。传统人的传统观念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社会主义不是“仙女下凡”。2005年，我在西宁和昆明等地讲课时，一直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仙女下凡”，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完美。社会主义需要在不断改革、建设中发展和完善起来。列宁曾经讲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必须采用人类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一切好东西。列宁为此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这个公式是：苏维埃制度 + 普鲁士铁路管理办法 + 美国的托拉斯组织和技术 + 美国的国民教育制度 + … = 社会主义。在这个公式中，除了苏维埃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外，其他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去继承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不在不断改革中弃旧图新，那就根本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

——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1984年前后，我多次在学术报告、文章和课堂教学中，强调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权利的回归”。到1991年，我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探索》一书中概括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从封建王侯到天主教堂，从罗马帝国到法西斯专政，从国内到国外，到处可以看到，像金字塔一样的权力机构在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长期矗立着。这种机构，使得身居高位的帝王将相可以随意将自己的意志，通过那些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系统、阶梯、中间僚客，由顶端有秩序地流向底层，强加于平民百姓，为的是使之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计划经济也是“集权经济”。如今，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还权、还利于民的问题，在农村是“还权于农民和还利于农民”的问题；在城市是“还权于企业和还利于企业”的问题；在全国是“还权于人民和还利于人民”的问题。农民、企业、人民的权利本来就属于农民、企

业、人民自己，“物归原主”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我主张“蓄水养鱼”和“藏富于民”。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改革之初，我在一次报告中说：改革一般是在一定社会的内部进行的，它不是要颠覆这个社会，而是要对这个社会中一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如制度、体制问题等，进行必要的改革或改造，使之更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有时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从这个意义是说，改革也是“革命”，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革，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历史的经验和国内外实践都证明，不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进行改革，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使我国早日步入世界先进发达国家行列。

——改革是一项关系中国命运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我国的改革是极为复杂、犬牙交错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制度和体制与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改革。经济制度和体制与政治制度和体制改革是系统改革的主轴。相对来说，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难度较小，政治制度和体制改革难度较大。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难啃的骨头也要啃，因为政治制度和体制改革，事关全局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但必须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社会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阻力很大，必须慎而又慎，要精心设计，稳妥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切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政治体制的弊端是社会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在我的有关改革的文章和著作中，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至关重要。我曾以史为鉴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大凡政治腐败都是从官吏腐败开始的，官吏腐败的根源在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如唐代的二王八司马，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海瑞，清代的康有为，等等，他们的改革主要是为了阻止各自王朝的政治腐败，缓和阶级矛盾，但这些改革不论规模多大，多么轰轰烈烈，尽管对历史的进程可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先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因为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封建王朝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防止动摇他们的统治基础，破损他们的既得利益，通常会在关键时刻必然阻挠、破坏甚至反对改革，导致改革的全面破灭。当前，我国的改革是从上到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是自觉自愿的改革，我完全相信我们的改革能够防止和克服历代悲剧的再现。

——计划不是规律，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早在1979年，即改革开放之初，我在《经济科学》《经济研究》等重点刊物上发表了《计划不是规律》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计划本身不是规律。科学的计划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是“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种意识形态。相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计划”，不是真正的计划，而是“空话”、“大话”和“假话”，是祸国殃民的“尚方宝剑”。

——对外开放是时代潮流，是社会改革的大方向。1986年前后，每当谈到开放的必要性时我总是指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相当时期内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这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要的还是与我们所奉行的“左”倾路线所导致的“关门主义”有关。那时，我们不仅在国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置于脑后，而且把这种“左”倾思想扩展到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去。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在本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影响下，只看到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和资本主义共处与合作的一面；只看到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一面，看不到或很少看到资本主义还有文明先进的一面。因而造成目光短浅，思维方法片面性和简单化，对于外部世界和外部环境习焉不察，甚至盲然，一切想当然，自以为是，我行我素。既不愿走出去，也不愿请进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这既是我们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我还强调，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

国，中国的开放是时代的大潮，浩浩荡荡，势不可当！

——政府既是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改革之初，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行动。政府在改革大潮中必然扮演双重身份或角色：它既是全社会改革的领导者、策划者，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者、推进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即要对自身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应当居先。如果自身不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或没有改好，就不能领导、策划和推进全社会的改革。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己不正焉能正人。

——政府的权力不等于政府的权威。我在先后发表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发表“政府的权力不等于政府的权威”的见解。在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肥大不等于强大，重量不等于力量”的一些反常现象。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政府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在使用权力时，一定要为民所用，用得好，用得及时，用得恰当，人民从中得到好处，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政府的权威；反之，政府的权威就会丧失。权威是政府的信誉和形象，是在人们心目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强加的。权威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无权威的权力，只能产生反抗力，很难有动力。更有甚者，权力如果滥用，还容易导致腐败和堕落。如果一个政府只有权力而没有权威，那是十分危险和可悲的。

——“万紫千红总是春”。我在讲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时曾多次借用宋代儒家朱熹《春日》的诗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既然是春天那就必然是万紫千红，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如黄色或灰色，那就不是春天，而是秋天或冬天。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有差别的、丰富多彩的、相互争艳的所有制。分配制度也是这样，多种分配制度同时并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差别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要改掉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大锅饭”思想和不求进取的思想作风。

——新体制如同一支“联合舰队”。1990年，在回首改革开放10年所取得成就时感到：旧体制如同一列火车，政府是火车头，只有火车头

有动力，而挂在后面的许多车厢都没有动力，只好由车头带动车厢（意指全部国民经济）运行。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随着车厢越挂越多，车头负荷越重，行进越来越慢，甚至一动不动。这就是旧体制致命的弊病。新体制如同一支联合舰队，包括“海”“陆”“空”三军，舰队中的每一舰船，都具有自我启动和运作的动力和功能，既可以各自为战，又可以联合作战，因而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向更高社会的过渡，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这种新体制能够在改革中很快地建立和完善起来，并相应地发挥它应有的互通、互动的作用。

——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1996年，当我国经济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我在《中国贸易报》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的成败关键在政府》一文。文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以史为鉴。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其成败与否或成效大小，最终取决于中央政府，特别是最高决策者。古往今来，中国的改革不下数百次，事实证明，凡有较大影响或在一段时间里取得成功的改革都是得到最高统治者支持的。相反，最高统治者不支持甚至反对，改革注定要失败。春秋战国时期，商鞅是个著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主张在魏国未能得到魏惠王的支持，结果一事无成；后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支持，改革就成功了，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到了宋代有几次改革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改革），得到宋仁宗的支持，不到半年，10条改革纲领就有9条颁布实施。后来仁宗态度转变，不支持改革，范遂被逐出朝政，改革败北。王安石变法得到宋神宗的支持，改革雷厉风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社会出现了生机，改革收到明显成效。宋神宗一死，宋哲宗继位，高太后掌皇权，便扶持守旧派打击改革派，新法随即被废，王安石变法宣告全盘失败。在近代中国，戊戌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改革有声有色，但当掌握皇权的慈禧太后反对改革，改革派人头落地，死的死，逃的逃，改革宣告失败。当然改革派的改革主张有时难免会有一些不当之处，如施之过猛，或考虑不周，或操作失误，或用人不当等，但这些都可以在皇权支持下逐步得以克服或改进和完善，

如不予支持，再好的改革主张也难以实现。

——**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有缺点的好制度。**改革开放后，我逐步认识到，在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类已经找到的所有经济制度模式中，通过历代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坏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弹性较强、刚性较弱，包容性较广、排他性较少的经济制度，也是比较容易自我调整、变革和完善的经济制度。它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本身蕴藏着巨大内生能量，比如，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性和本能，它给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带来压力，使懒惰者变得勤奋，守旧者向往革新，封闭者乐于开放。这些都会持续不断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进步，成为历史和当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力源。当然，它也有缺点，它的主要缺点是，凸显个人财产所有权，个人能力和拼搏，个人享乐，淡化个人与亲朋好友、组织、社会等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必须把这些关系纳入法律的、制度的框架之内。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会导致自私、贪婪等心理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其他一些问题。但是，比较而言，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过的制度中最有效的经济制度。

——**“替代支付制”是旧的分配体制的致命弱点。**在分配体制改革还未全面铺开之前，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多次指出，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三高三低”问题，即高补贴、低工资，高消费、小市场，高投入、低产出，其根源在于由国家财政补贴而形成的“替代支付制”，低工资是其症结点和出发点。低工资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机制，即“扩补机制”和“压价机制”。而在这两个机制的交相作用下，必然造成种种严重后果，如投资膨胀、消费膨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价格扭曲、效益低下等，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的生活困难。基于上述分析，我当时开出三剂“药方”：一是把低工资制转变为工效挂钩的效益工资制；二是把等级补贴制转变为结构补贴制；三是把无偿福利制转变为有偿社会保障制。

——**广告宣传不能搞假、大、空。**我在一次媒体的论证会上曾大声

疾呼：广告宣传一定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搞假、大、空，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1994年，我在《浙江经济》发表的《剖析广告战略》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广告最本质的功能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效用的信息，为消费者服务。所谓“广而告知”，道理即在此。可是，有些“广告”却成了一些企业和广告商用来欺骗消费者以达到骗取钱财的手段。我不是说广告宣传不必要，在高度市场经济发达的时代，广告宣传还是不可少的，否则，再好的商品也难以推销出去。但是，任何广告宣传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说的是广告费在企业经营支出中要适当，不宜过大。广告费是要进入成本的，广告费过大了，成本增加（有的广告费占产品成本的50%以上），盈利减少，甚至亏损，这就断了企业发展的生路。更何况在有限的资金中，广告费多了，技改投入就少了，必然影响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技术和产品不创新，企业就无生机和活力，更无竞争力。虚假的广告宣传，即使能很快把企业抬高，几乎尽人皆知，可是好景不会太长，当消费者从受骗中觉醒过来之后，企业和人都斯文扫地，很自然又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现实生活中像爱多、秦池、巨人等企业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在这里，我联想到一些广告商，包括电视台特别是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特别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带有党和国家性质的重要媒体，还有形形色色的“明星”等，不能光为捞钱，不讲原则，不计后果，不对消费者负责，甘当一些投机商的“帮凶”，成为“教唆犯”，只要给钱就给宣传，给大钱就大宣传！要知道有意帮助企业欺骗消费者不仅会自毁形象，而且要违背道德、良心，并要负法律责任。我建议严格执行广告法，用法律约束和制裁搞假宣传的企业、媒体和传媒人，不能让他们为了捞钱而随心所欲和胡作非为。

——媒体不能充当企业家的杀手。我曾在一次媒体座谈会说过：媒体不能充当企业和企业家的杀手。一般说来，中国的企业家是缺乏理性的，媒体是让企业家失去理性的原因之一。成功时争相把企业家捧到云端，加剧了个人的膨胀；发现一些问题或危机的踪迹时，恨不能一起把企业家肢解投到井里，让他们连反省、自救的机会都没有！好像自己这

时候越卖力，越能洗刷掉“捧错对象”的过失。事实上，又有谁去追究媒体的责任呢？媒体理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可又有几家遵守了呢？而且中国的媒体还有个奇怪的心理，即同情弱者，惩治强者，所以那些处于镁光灯下的强者们，很容易被媒体杀伤。这也是为什么往往民营企业在强势的时候也会顷刻间陷入危机，这不得不归功于媒体的追查与大肆传播舆论。

——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必须化解矛盾，扩大兼容的有机结合。1999年春，在一次我国改革开放2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矛盾、兼容、结合》（后分别发表在多种报刊上）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磨合过程，并明确指出，在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既存在矛盾的一面，又存在兼容的一面。矛盾表现在：国有经济的价值取向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很不一致；国有经济的权力外化性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权力内生性和内向性是根本不相称的；国有经济要求的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国有经济的政企不分和作为真正的企业所要求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很难相容的。相容表现在：发展国有经济可为发展市场经济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国有经济对弥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起着重要作用；国有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长远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保证；部分基础工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高风险产业以及部分幼稚产业等需要国有经济。正因为如此，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传统的制度、体制、结构的改造、改组和调整，缓解矛盾、扩大兼容，达到一定程度相结合的目的。

——对民企应实现“五放”“三看”“三不看”理念。2000年8月，我在一篇《要善待民营企业》中说：虽然目前民企由于自身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点，如旧的观念、体制、制度、习惯、传统势力等，都严重危害了民企的发展，但我们应当看到，民企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当时我就提出“五放”的设想，即放心、放手、放宽、放开、放活。在如何看待民企和国企时，我提出“三看”和“三不看”主张：不看性质看贡献；不看成

分看发展；不看规模看效益，呼吁国家要切实给予民企同国企同等的国民待遇，大力促进民企的发展。民企不发展，改革无望，而国危矣！

——“私”到极处可变“公”。2001年8月，我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大潮中，有一批有知识、有能力、有胆略、有干劲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富裕起来，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实力派。目前社会上对这些人的说法不一：有的叫中产阶层，有的叫中产阶级，有的叫中等阶级等。其实，这在英文中就是一个词：middleclass。这一名词对老百姓来讲比较陌生，但他们有通俗的叫法，就是“有钱人”，或称“大款”，或叫“大腕”“大鳄”。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中产阶级就是资本家阶级，是布尔乔亚。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中产阶级不等于资本家阶级，其中有资本家，但更多的是智力劳动者，包括建筑师、律师、会计师、统计师、影星、歌星、体坛明星、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个体工商户等。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术、才干、胆识，换来的是阳光下的财富，还有地位、名望和相应的别墅、轿车、高档时装、舒适的工作环境、浪漫的生活方式等，按理讲都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大惊小怪！这部分人的出现，完全符合改革的初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他（她）们获得的不仅是劳动收入，也获得了人力资本的收入，即分享价值创造的成果。他们的收入不单纯是生理层面上的需要，而更多的是个人价值、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目前，这一部分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个阶层还会进一步壮大。当然，在这部分人中，还必然会出现一些乐善好施、泽及众生的人，在一定范围内，“私”到极处可变“公”。现在有好多富人，解囊助学和解囊济困就是很好范例。

——“杀富”和“仇富”都是对改革的“反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规律和机制作用的结果，贫富两极分化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防止“仇富”心态的滋生和发展。仇富心态不利于社会进步。政府应当创造使富人放心致富的环境，让人们大胆致富。社会应当保护富人及其私有财产，并尊重富人。那么，对贫困、弱势群体应当怎么办？我在多篇文章中强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各项征管与税收体制和政策，建立和健全各种保险与保障机制和制度，在不影响

社会进步的情况下，适当地均衡社会财富的分配，防止两极分化过大，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时，我认为，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采取任何以暴力为依据的“杀富（指合情、合理、合法的富）济贫”的办法都是错误的，甚至会阻碍社会进步。当然，对那些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聚敛不义之财的人；对那些有了钱财之后不顾社会影响，作威作福作恶多端的人；对那些任意挥霍财富，污染和恶化社会氛围的人等，均应绳之以法，而且越狠越快越好。

——公平不公平是相对的。我曾在《论公平》一文中说道：公平不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有两种：一是起点不公平。如有些人生在富豪之家，或生在大城市，或生在天子脚下；有些人生在贫困之家，或生在穷乡僻壤，或天生残疾和弱智等。二是中间和结局不公平。如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社会分配不公等。对于前者，只能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缩小城乡差别，普及义务教育，实施同工同酬，消除各种身份歧视等手段来解决；对于后者，只能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体制及机制来解决。总之，我们既要接受社会客观存在的不公平现实，又要以积极态度想方设法解决不公平现状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绝对公平不仅是地道的空想社会主义，即使达到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也不会有。

——世界上不可能有永恒完美的制度。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人类发展长河中，不可能有很完美和永恒完美的经济或政治等各种制度，包括共产主义。制度的好坏是相对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要不断地改革。改革的目标，为的是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中国的改革道路是漫长的，是永远走不完的，又要永远走下去。欲速则不达，改革要有韧性，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

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名普通的理论工作者，要对改革有贡献，光有勇气是不够的，最重要的必须要有时代的感悟力和洞察力。而这两种力量又不是从书斋中和个人天赋里所能得到的，而必须对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对现实有正确的看待，对发展有明确的判断，能听取不同的声音，并在跌宕起伏的环境中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

如实地说，在对待改革开放理论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看法上，尚不

限于上述这些，但这些是主要的。正是由于上述这些观点，自然形成了我的不太成熟的“改革观”。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的这些看法，只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也应看到，正是在这一滴水中，却能反射出正在上升的“太阳”的光辉。

最后，必须说明的，我的改革观是在 30 多年改革不同时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因而在此书的论述中，当提到这些观点时，必须回索或回到那个时代的改革情况。

目 录

· 中 卷 ·

第六编 综论

第一章 改革的要务是解放生产力	3
第二章 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	11

第七编 观念更新： 企业改革先行官

第一章 观念更新：企业创新的前提	21
第二章 现代企业和企业家必备的若干战略意识	33

第八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一章 从产权制度的演变中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41
第二章 公司法人和公司法人财产权	48
第三章 中国企业也需要一场“经理革命”	56

第九编 国企改革的历程和模式

第一章	强化财产利益是国企改革的根本	65
第二章	租赁制和承包制	82
第三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制	106
第四章	股票及其行市	114
第五章	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股份制	121
第六章	中国股市的弊端	129
第七章	中国股市为何大起大落	133
第八章	企业产权的转让，企业兼并和破产	140
第九章	国企改革 30 年的回顾与展望	157

第十编 民营企业改革

第一章	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现状	173
第二章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182
第三章	民营企业的产权改革	185
第四章	家族企业管理理念	193
第五章	民营企业如何应对 WTO	199
第六章	民营企业的决策误区	207
第七章	群星“陨落”的思考	219

第十一编 企业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

第一章	制度创新——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	229
第二章	管理创新——企业振兴的必由之路	245

第十二编 西部大开发和移民

第一章	五化：西部农村大开发的必由之路	265
第二章	以开发式移民促进就业	277

第十三编 发展全方位的外向型经济

第一章	对外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滚滚大潮	285
第二章	大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308
第三章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看自由贸易区	313

第十四编 改革红利和改革愿景

第一章	力争改革红利最大化	321
第二章	誓将改革进行到底	331